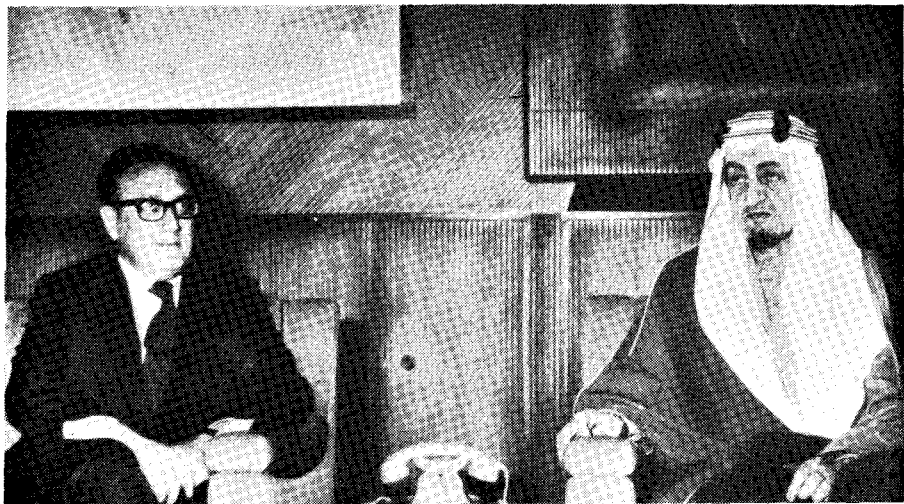


动乱年代

——基辛格回忆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在利雅得拜会费萨尔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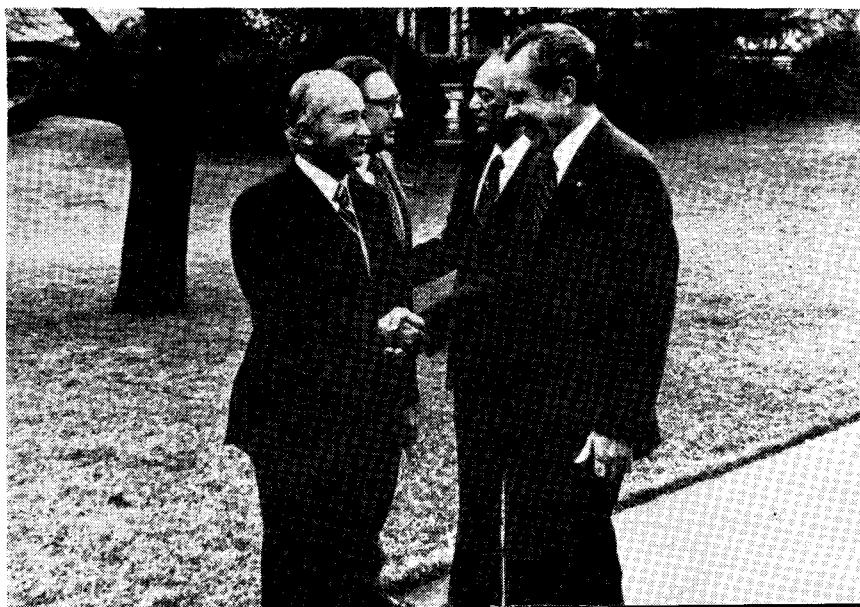


在吉萨游廊上“抢镜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八日
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会晤。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
法赫米和萨卡夫访问白宫后告别。



目 录

第十一章	中东战争·····	1
第十二章	莫斯科，停火，戒备·····	132
第十三章	第一次中东突破·····	220
第十四章	波斯湾插曲·····	299
第十五章	阴影笼罩着周恩来；同毛泽东再次会谈·····	314
第十六章	盟国的纠纷·····	341
第十七章	日内瓦会议·····	401
第十八章	第一次穿梭外交：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	474

第十一章

中东战争

我们大家都如梦方醒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星期六，早晨六时十五分，我正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饭店我的套间里酣睡。这是我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时下榻的总部。突然间，精力充沛的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J·西斯科闯进了我的卧室。我正在竭力使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西斯科用粗哑的声音几乎是喊着对我说，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交战了。但是他确信，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每一方都确实把对方的意图领会错了。如果我能迅速果断地使双方消除误会，就可以抢在他们交火之前使局势得到控制。西斯科对我的能力是过誉了。遗憾的是，尔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我的能力的估计过高。

促使西斯科来把我唤醒的原因是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前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发回来的一份急电。两小时以前，果尔达·梅厄总理把基廷召到她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以色列领导人在那天还照常办公是极不寻常的，因为那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这是进行斋戒、祈祷和反省的日子。它提醒人们，和上帝相比，自己是渺小的。这是犹太新年放假季节的高潮，按照传统的说法，上帝每年在这一季节里决定所有凡人来年的命运。

梅厄总理带给我们的令人惊愕的信息是：以色列同命运的遭

遇战已然开始。“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她对基廷说。美国和以色列都曾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调动只不过是军事演习，可是突然之间这种调动变得带有威胁性了。基廷提醒她说，不到十二个小时以前，以色列国防部的官员们还向他保证，形势并无任何危险。梅厄夫人回答说，这种说法已经不准确了，以色列人现在确信，埃及和叙利亚将于当日下午稍晚的时候发动协同进攻。她认为，既然阿拉伯人肯定会被打败，那末这场危机一定是由于他们误解了以色列人的意图而引起的。美国是否可以紧急转告苏联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以色列无意进攻埃及，也无意进攻叙利亚？以色列正在征召“若干”名后备队，但是为证明其和平诚意，决定不进行总动员。基廷问以色列是否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果尔达断然重申，以色列希望避免流血，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首先挑起敌对行动。

当西斯科把我唤醒的时候，中东的和平局势只剩下九十分钟了。埃及和叙利亚把他们的备战活动隐蔽得十分巧妙，以致于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以色列人估计进攻到来的时间还是比实际预定的时间迟四个小时。我很清楚，阿拉伯的进攻若是事先策划好的，那么任何外交努力都无济于事。但是，我的看法仍然摆脱不了以色列例行报告的影响，而这些报告又都是为我们自己的文电所证实了的，这就是认为这样一场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投身于一段狂热而紧张的外交活动之中，为的是阻止一场冲突。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行动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意图产生了误解一说，我几乎信以为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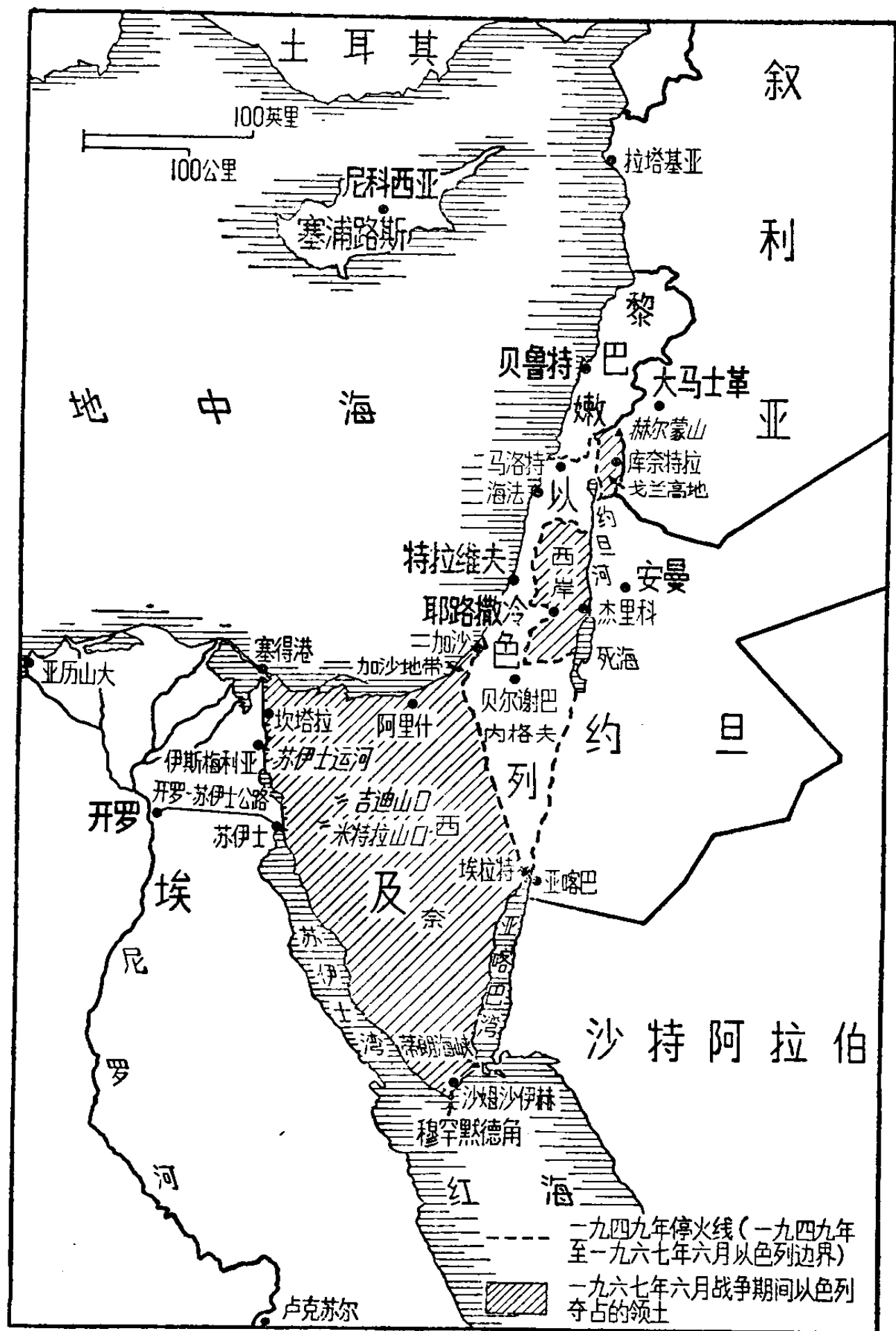
在决定政策的人眼里，一场危机并不总象是一连串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通常表现为由许多琐碎的日常工作组成的极其繁重的议事日程表，既需要对之专心致志，又得颇具耐心。有时要被迫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一鳞半爪的情报做出反应。有时由于渴望取得

全面了解，还必须在一片无知的混沌之中开出一条路子来。一场危机在其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又分解为许多细节，必须十分仔细地对待。这种细节之一，就是必须确保有关各方进行工作时所依据的是同样的一批情报。在赎罪节的那天早晨，当战争潜入中东的时候，情形就是如此。

早晨六时四十分，我打电话到华盛顿苏联大使馆找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被从床上喊醒后，声调困倦，而且有点糊涂（也许是装糊涂）。我要他紧急地向莫斯科以及开罗和大马士革说明，以色列已通告我们它并不是在计划任何进攻性的行动。

起初，多勃雷宁声称这整个事件必定是以色列玩弄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证明它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是有理由的。我告诉他，我给他打电话的目的正是要担保以色列不会这样做。接着，他又玩弄迂腐的外交手腕，要问明究竟是谁向谁传递口信——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做出保证呢，还是美国对苏联做出保证？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如果再象这样扯下去，那末在你还没有弄明白我的话以前，战争就要爆发了。”多勃雷宁又找出另一个借口来拖延时间。他说他怀疑他的通讯工具是否能很快地报到莫斯科，使之得以及时采取行动。于是，我主动提出他可以使用我们这一头的“热线”终端。他又暗示说“热线”在苏联的那一端离外交部太远。（此时我不禁发生了怀疑：一旦发生大国之间的危机，“热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于是，我就把白宫的电话交换台交由多勃雷宁使用。他装做十分感激的样子接受了。

其实，这些话全是瞎扯。多勃雷宁有着超等的通讯手段。他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从莫斯科得到答复（后来在这场危机中他证实了这一点）。我现在认为，当时他预料到他同莫斯科的通话会被我们偷听，所以他想使用美国的公开通讯系统，从而取得一项旁证，以对付有关苏联同其阿拉伯友邦进行勾结的指控。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前的以色列及其邻国

早晨六时五十五分，我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馆代办莫德查依·沙列夫。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既热情洋溢又文静庄重的老资格的外交家。（当时，西姆查·迪尼茨大使因父丧回以色列去了。）我告诉沙列夫，梅厄夫人关于不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保证已向苏联人转达了。我认为他应该把这一点，连同我本人关于应避免鲁莽行动的请求，一并向耶路撒冷报告。

早晨七时正，我打电话给当时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埃及外交部长麦哈麦德·扎耶特。为了节省时间和避免进行解释，我逐字逐句地向他宣读了以色列的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一天以前，扎耶特还在和我讨论如何就中东和平问题开始谈判。美国打算在以色列定于十月三十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后立即进行谈判。我确信扎耶特并非佯装不知情。萨达特并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很多人。

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外交这种工具显得很失调。人们凭直觉都想要加快速度，而为了做到精确，却必须耗费时间再三重复。扎耶特同多勃雷宁一样，让我重读一遍以色列的信件。就扎耶特来说，我有理由确信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困惑不解。虽然他表示他非常担心这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借口，但是他说要把这封信立即转发。我告诉他我们是会支持以色列实现其保证的。

下一步，我试图同当时也在纽约的叙利亚副外长莫哈迈德·扎卡利亚·伊斯梅尔取得联系，但是没有联系上。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团根本没有接电话。

到了早晨七时十五分时，沙列夫已向我重申了果尔达·梅厄的保证——以色列决不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七时二十五分，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碰巧多勃雷宁正在通过白宫和莫斯科通话。我让他的助手奥列格·叶达诺夫务必请多勃雷宁在结束通话之前把以色列重申的保证转告莫斯科。

早晨七时三十五分，我再次给扎耶特挂了电话，把以色列重申的保证和我们对这项保证的担保告诉他。七时四十七分，我向多勃雷宁查询时，他说我们的口信已经转达给莫斯科了。我把同扎耶特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要求他帮助我同叙利亚人取得联系。我说：我们“不会耍什么花招”。莫斯科会得到我们同各方面联系情况的通报。

与此同时，我指示我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上将，上午九时，在我不能出席的情况下，由他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以征求政府其余人员的看法。

上午八时十五分，扎耶特打电话告诉我开罗的答复。他声称以色列进行了“挑衅”；以色列海军部队在空军支援下，向苏伊士湾埃及的阵地发起了进攻；以军正在被击退之中；为此已发表了公报。这一说法真是荒诞无稽。以色列竟会背弃一项仅仅几个小时前才向美国作出的保证，这是不可能的；它竟然会在赎罪日发动一场战争，这是不可思议的；发动进攻而又不在于事前进行动员，这也是不符合以色列特有做法的；而且在离以色列边界最远的地方，利用海军来挑起敌对行动，这对以色列来说则是愚蠢的。我对扎耶特冷冷地说，我希望埃及能把它的军事“反应”限制在“攻击”发生的出事地点，而我将立即同以色列接触以求澄清事实真相。我把白宫的通讯设备交由扎耶特使用，让他和开罗通话。幸亏我们白宫的那些英雄的接线生们对我都已经很熟悉了，否则，在线路中出现大量的外国口音可能会把他们吓坏了。

上午八时二十五分，我和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通了电话，他那时也在纽约。我把扎耶特关于以色列在苏伊士湾发动了进攻的指控告诉了他。埃班和我都认为在以色列最神圣的节日里采取这种行动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但他答应立即向耶路撒冷查询。^①

上午八时二十九分，沙列夫从华盛顿来电话告诉我，来自以色

列的报告称，埃及和叙利亚的飞机在各条战线上展开袭击已经长达半个小时之久。^{*}是否进行了地面作战，他还没有得到消息；对于所谓以色列进行了“海上攻击”，他则一无所闻。

上午八时三十分，我向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国王发去加急电，敦促他们施加影响以避免敌对行动。（这种加急电报享受最为优先的处理，可在几分钟之内送达目的地。）但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如果这一进攻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两个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是无法加以制止的；如果它真是由误解造成的，他们也无法消除这种误解。当天深夜他们的回电表明，他们是局外人。侯赛因表达了他对爆发了敌对行动感到的关切；费萨尔则强调阿拉伯团结。此后，他们二人始终都置身于军事冲突之外。

上午八时三十五分，我接通了总统的参谋长黑格的电话，他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岛同总统在一起。我通过黑格报告总统，战争看来已经开始了。黑格和我对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了一番猜测，但未得出什么结论。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他们向埃及人建议说，需要挑起一些小小的事端，才能推动外交活动的开展，结果“那些狂人一下子把事情干得过头了。”我提议佛罗里达州的白宫发言人、副新闻秘书杰拉尔德·L·沃伦对外不必多说，只提总统正在按期不断地得到有关事态发展的报告，对情况十分明了。

上午八时四十分，我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挂了电话，把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他不可能对实质性的讨论施加什么影响，但他态度友好，能够在程序问题上提供帮助。他可以推迟或提早召开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他还

^{*} 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进攻是在中东时间大约下午二时，也就是华盛顿时间上午八时开始的。下面可以看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官僚们才一致相信战争的确已经爆发了，或者说，我们的官僚们才相信阿拉伯人已经发动了战争。

是一个爱传小道消息的人。如果你有话不愿直说，比如隐晦的威胁，或是过于微妙不便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的妥协方案，那末你可以放心，他一定会替你把手话传出去。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他的合作，以便减轻任何对于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惧怕心理。我促请他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叙利亚人（我们一直与之没有直接接触）和埃及人保持克制。瓦尔德海姆多少有点悲哀地说，一天前他曾同叙利亚外长坐在一起进午餐，但是后者对此却只字未提。对此，我颇表同情，因为在我和扎耶特之间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虽说指望叙利亚或埃及会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突然袭击未免是奢望。

上午八时五十分，埃班打电话来转达了同沙列夫一样的保证，即：以色列不会先发制人。显然，使用重复的渠道来传递信息并非美国人所独有。埃班对所传苏伊士湾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海上交火一无所知。

我的下一项任务就是指示斯考克罗夫特有关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事宜。如果当真爆发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当时我们还不敢肯定如此），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两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和该怎么讲。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预期以色列会迅速取得胜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历次中东战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变成了一场国际危机。阿拉伯人的挫败会引出苏联人的威胁。当时还存在着西欧同我们分裂的危险。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欧洲从来没有感到舒服过；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欧洲的一些领导人当时正在寻找借口，借以建立即便不是反对美国也是脱离美国的欧洲自治。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出尼克松的声誉因水门事件而受到了损害。我们有必要表明我们决心防止苏联干预，但我们又必须有节制地进行这件事，既表示出我们的信心，又不显得软弱可欺。

我从纽约告诉斯考克罗夫特，要求他在中午时分首先使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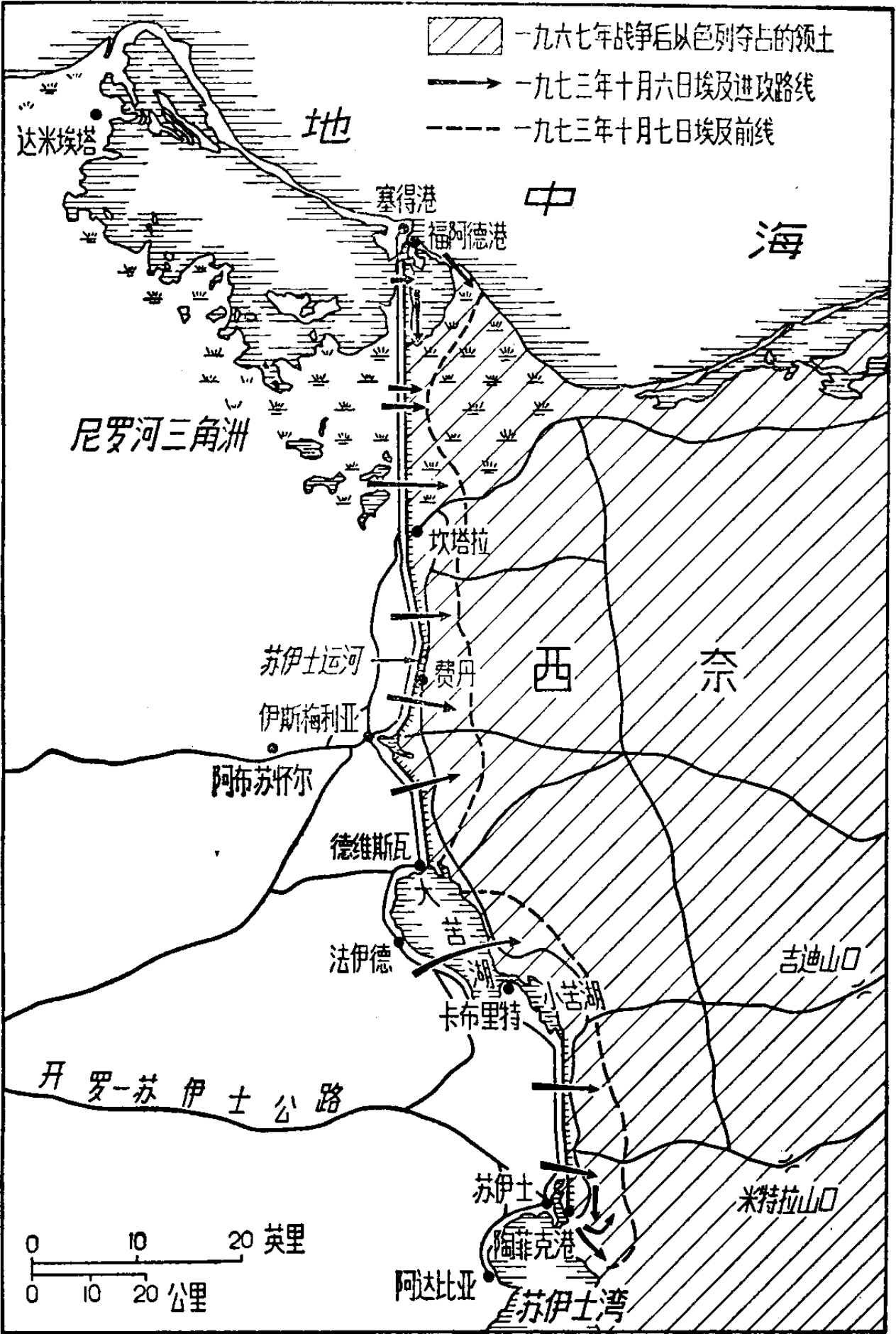
通过一项把当时分散停靠在西班牙和希腊港口内的美国第六舰队调到东地中海的计划。其次，还要通过在必要时增援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的计划。部队调动还不宜进行，但我们的部队必须加强战备。各单位都不得自行对外发布消息。到了该表态时，黑格或者我本人会表态的。至于是由白宫还是由别的机构负责吹风，则应由总统或黑格决定。

随后，上午九时，沙列夫紧急通知我，埃及部队正在试图越过苏伊士运河。一场海战的说法只不过是埃及方面的“障眼术”。九时零七分，以色列的第二条通讯渠道突然又活跃起来。埃班来电话告诉我同样的消息。尽管埃班的消息来得晚了一些，但他那雄辩的口才弥补了这一不足。他说：“总理要我告诉你，关于我们在苏伊士湾发动海上攻击的说法纯属虚构。她的希伯来语汇非常丰富，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话。”他还说以色列正在做出防御性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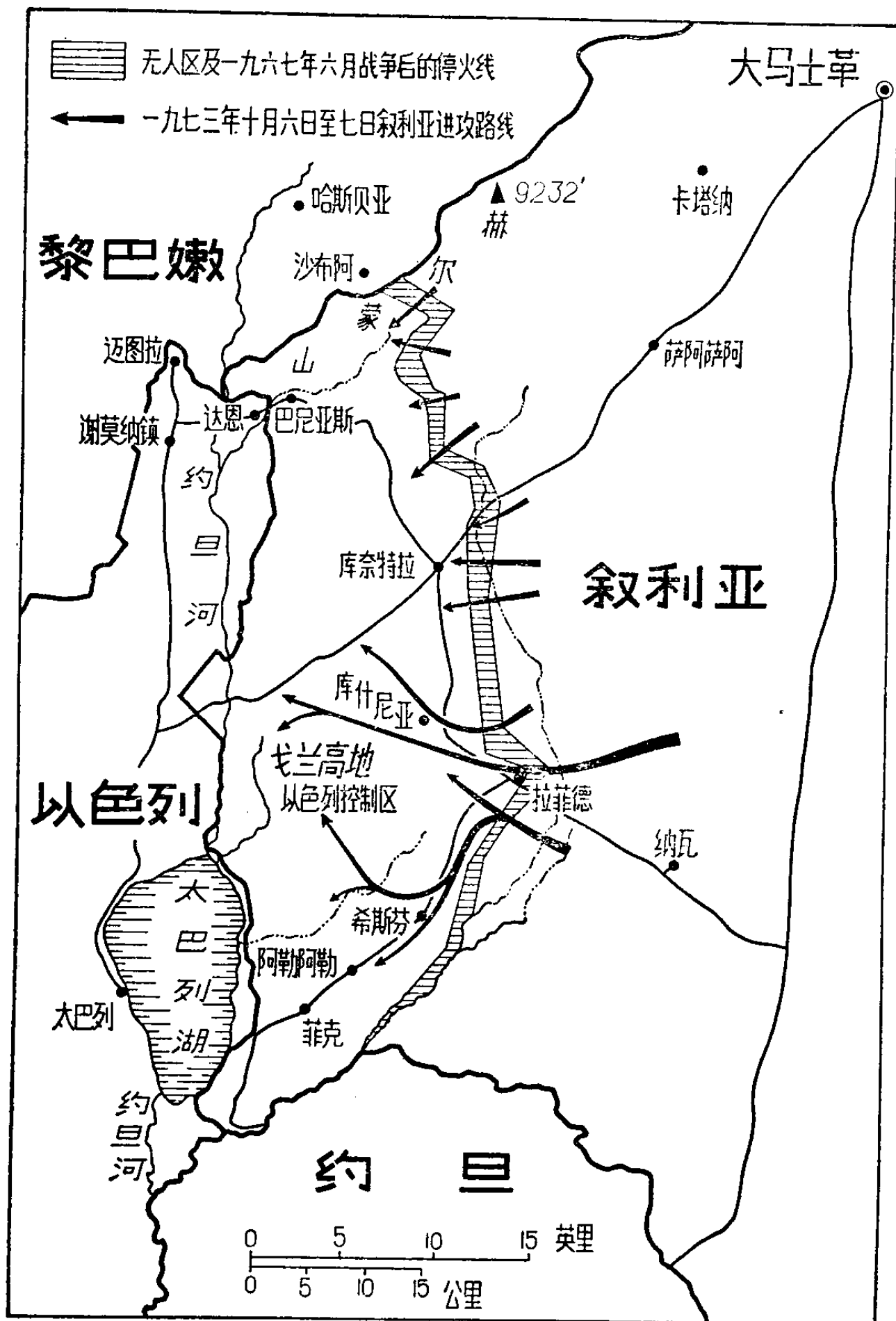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于上午九时在华盛顿白宫的情况室里召开。我们得到的情报落后于我在纽约所了解到的情况。尽管军事行动显然已经发生了，大家一致的估计却仍然重复着整个一周以来的看法，即：发生一场蓄意发动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情报部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表明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跨越运河和进占戈兰高地的埃及—叙利亚协同进攻。毋宁说，更多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行动—反行动的局面，即每一方都对它所看到的威胁做出系列的反应，结果就使得对抗的潜在危险日益增加。目前的敌对行动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产生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澄清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很可能，埃及人或是叙利亚人，特别是后者，一直在准备发动一场袭击或别的小规模的行动。

会议对此并无反对意见。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如何被“行动—反



西奈前线：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进攻路线图



戈兰前线：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至七日叙利亚进攻路线图

行动”这一循环所触发，在相隔两百多公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则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报告说，据大马士革电台报导，是以色列发动了这次攻击。对此科尔比没有提出异议。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评论说，虽然叙利亚讲真话的信誉并不高，但若是有一场中东战争不是由以色列发动的，那也是二十年来前所未有过的第一遭。他说：“我就是看不出埃及和叙利亚方面发动战争的动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认为，以色列发动这场进攻可能是为了抢先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引进更为尖端的防空设备。只有西斯科的副手阿尔弗雷德·L·（罗伊）艾瑟顿对上述一致看法提出异议。他说：“如果以色列人想搞点什么名堂的话，他们怎么也不会在一年中选择这一天动手。而且也没有发现以色列人事先进行准备的迹象。”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纽约，由于我没有什么先入之见需要为之进行辩解的，所以我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疑团早已解决了。我对多勃雷宁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当多勃雷宁对此提出异议说扎耶特所说与此相反时，我厉声回答说：

你我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如果他们（以色列人）要进攻的话，他们是不会在苏伊士湾发动攻击的……如果真的是以色列海军首先发动进攻，那么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怎么能够在同一时刻在全线发起攻势呢？

我警告多勃雷宁说，如果中东失去控制，那么东西方关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有丧失的危险。这是一场持久的决斗的开始，在这场决斗中，华盛顿和莫斯科尽管都公开声明自己是致力于合作的，但却都在不冒公开对抗风险的情况下力图削弱对方的实力。

我们为什么感到意外

自从有战争以来，在美国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

来，突然袭击就是军事著作和军事分析的主题。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情报工作中的差错所作的首创性研究，就把偷袭归结为可能遭到袭击的一方缺少从琐碎小事中辨认重要情报的能力。表明进攻迫在眉睫的证据，往往被干扰“杂音”——一大堆含混不清、互不相干或彼此矛盾的其他情报——所盖过。^② 沃尔斯泰特对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对俄国发动进攻所作的颇具洞察力的学术性研究，使他的分析又深入了一步：进攻者有可能泄露其活动，但对活动的目的却总会加以隐瞒。^③ 因此，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并未试图隐瞒德国在苏联边界上集结军事力量的情况；事实上，德国的军事集结规模之大使其无法隐藏。但是，希特勒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而斯大林也相信）：德国总会发出某种最后通牒，从而导致谈判，而不是战争。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国的军事分析家孙子就曾写道：“兵不厌诈。”^④

埃及一叙利亚的进攻是一次典型的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但是，十月战争的偷袭既不是干扰“杂音”，也不是诈术所能完全解释的。它是错误理解事实的结果，而这些事实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并没有被互相矛盾的情报弄得模糊不清。萨达特总统很有勇气，差一点讲出了他准备要干的事情，而我们并没相信他的话。他向我们提供大量情报，使我们应接不暇，得出错误的结论。十月六日的突然袭击是由于其受害一方的政治分析出了差错所致。

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前，以色列（和美国）所作的每一项分析都一致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缺乏用武力夺回其领土的军事力量，因此不会发动战争。阿拉伯军队必定会失败，因此他们也就不会进攻。这些前提是正确的，而结论则是错误的。十月战争以后，以色列人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埃及当时对是否能打到距苏伊士运河仅二十到三十英里的西奈半岛各个要隘也并没有当真地抱什么希望。埃及部队曾经训练多年，以求完善地掌握横渡苏伊士运河的技能；抵